

# 基于供给改善视角的宏观调控:理论逻辑与政策取向\*

刘健<sup>1</sup>,杨德才<sup>2</sup>

(1.安徽财经大学,安徽蚌埠 233041;2.南京大学,江苏南京 210009)

**摘要:**中国经济很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成为一种“新常态”,并逐渐演化长期的、结构性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的现象。单靠传统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彻底破解中国经济的困局,有必要在宏观经济分析中寻找更加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不再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三架马车的需求拉动,而是通过改善供给来创造需求,更准确的是依靠减低宏观税负、放松对企业规制和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关键词:**新常态;供给学派;宏观税负;企业规制;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8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404(2016)74-0047-08

## 1 引言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然而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速首次跌至7.7%,其后三年增速分别为7.7%、7.4%、6.9%,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连续四年低于8%,基本可以判断中国经济增速将会从高速转变为中高速。对未来经济增长的估计结果同样不容乐观,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模拟实验室的预测结果显示,2016~202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区间为5.7%~6.6%,2021~2030年仅为5.4%~6.3%,这意味着未来的经济增长步伐很可能会进一步放缓,这引起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关注,并引发对经济可持续性增长的担忧。

本文认为当前的增速放缓与传统意义上短期降速有着本质区别,那就是中国经济很可能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中高速增长态势,成为一种“新常态”,并逐渐演化长期的、结构性的现象,而不是一个短期的、周期性的现象。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很可能不再是依靠投资、出口和消费三架马车的需求拉动,而是通过改善供给来创造需求,更准确的

说依靠新供给创造新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创新需求。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需求视角下的经济增长源泉依赖投资,消费和净出口。供给学派观点主张通过促进市场供给,增加产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活动,比如抵制垄断、解除管制,主张经济自由化,通过放松供给端约束、鼓励和支持生产性活动来增加潜在产出水平。

## 2 “赶超型”经济体的经验启示与中国经济“新常态”

### 2.1 “赶超型”经济体的跨国比较

从人类近现代历史上来看,人均GDP超过8%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一些后来崛起的“赶超型”的国家和地区。林毅夫教授的研究结论表明,二战后能够持续20年保持经济增速超过7%的国家或地区分别如下: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阿曼、巴西、马耳他和博茨瓦纳,其中亚洲占绝大多数。日本1950~1973年平均增速为9.3%;韩国1971~1996年的平均增速为9.1%;阿曼1967~1989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4.8%,中国台湾出现了持续35年8.8%高速增长;新加坡1976~1997年平均GDP增速为8.2%。中国香港从1974~1988年均增速为8.2%;博茨瓦纳1968~1989年均GDP增速超过10%;巴西1968~1987年均GDP增速为7.4%。这些“赶超型”经济体在经济崛起过程中都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平均增速8%左右,持续时间为20~40年。

收稿日期:2016-06-18

作者简介:刘健,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杨德才,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后,主要从事新制度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史等方面的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5CJL018)、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2014D40)的资助。

表1 “赶超型”国家或地区的高速增长期与  
降速换档期

国家或地区	高速增长期(增长率)	降速换档期(增长率)
日本	1950~1973(9.3%)	1974~1992(4.3%)
韩国	1971~1996(9.1%)	1997~2012(4.3%)
新加坡	1976~1997(8.2%)	1998~2012(5.3%)
马来西亚	1961~1997(7.3%)	1998~2014(4.4%)
泰国	1961~1996(7.8%)	1993~2014(2.8%)
印尼	1968~1996(7.5%)	1997~2012(4.1%)
阿曼	1967~1989(14.8%)	1990~2013(4.4%)
巴西	1968~1987(7.4%)	1987~2014(2.5%)
马耳他	1972~1991(7.2%)	1992~2013(2.9%)
博茨瓦纳	1968~1989(10.3%)	1990~2014(5.0%)
中国香港	1974~1988(8.2%)	1989~2012(4.0%)
中国台湾	1962~1996(8.8%)	1995~2012(4.3%)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网站资料整理。http://www.worldbank.org.cn/.

值得特别关注是:这些赶超型的经济体在经历了20年左右高速增长以后,无一例外地落入了经济增速的降速换档期。大部分国家的增速跌至高速增长期的一半,少数不到30%。日本1974~1992年均增速4.3%,比1950~1973年的经济增长时期的增速下降了一半还多,韩国1997~2012年平均增速大约只有4.3%,巴西1987~2014年增速只有2.5%,相当于1968~1987年的34%。阿曼1990~2013年经济增速只有4.4%,不到1967~1989年的30%。中国台湾平均增速下降了一半左右,只有4.3%左右;中国香港从8.2%下降到4.0%;在这些国家中表现最好是新加坡和博茨瓦纳。有理由相信后发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并完成了各自的工业化过程之后,经济增速突然下滑,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这样的状态是一个普遍性规律。

## 2.2 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

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与几位合作者研究分析所有具有经济增长时间序列数据的国家后发现,任何一个实现高速增长的国家,终究在某一特定发展阶段要减速。后来经过归纳,“特定发展阶段”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是17 000美元左右,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目前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新常态”意味着摆脱“旧常态”,所谓旧常态也称为“大稳定”或“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其三大主要特征: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相对温和的通货膨胀率和

较低水平的失业率。“旧常态”是产生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全球主要经济体致力于市场改革和体制调整,重新激发市场力量,为经济增长提供体制机制基础(李扬等,2015)。第二,中国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融入到全球市场,扩张了国际市场规模,并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其中劳动力市场的扩张贡献一半来自于新兴经济国家(Richard Freeman, 2005)。第三,技术进步贡献提升,金融领域创新为技术投资提供风险资金和融资渠道,科技创新得以快速推进和大规模产业化,欧美国家的进入技术创新的黄金期(Gordon, 2005)。

现有文献对于中国的“新常态”根源解释有三种:结构调整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累及增长率下降;出口下降和消费低迷导致总需求疲软;人口红利消失导致工资成本上升出现要素供给瓶颈。低收入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以后,经济结构将会从以高端制造业为主向低端服务业转变,全要素生产率(TFP)不可避免会出现下降趋势,并累及经济增长率下降,中高速增长将会成为常态(李扬,2015;洪银兴,2014)。从需求视角解析“新常态”结论是:困扰于外部冲击和内部环境的影响,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短期恢复到过往水平的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外生变量出口需求受制于欧美国家经济恢复缓慢的影响,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调整将会是一个漫长过程,寄希望于内部公共投资来解决需求,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与化解产能过剩(伍戈等,2013)。供给视角解释“新常态”认为技术进步水平缓慢拖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以及人口参与率下降,劳动力供给面临数量约束的同时工资上升压力加剧。来自供给和需求的共同作用下塑造出经济的新常态,供给方面由于要素市场均衡发生变化导致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延缓生产率提升,需求视角分析的结论是投资收益率下降抑制了投资需求,外需下降使得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两个方面因素促成“新常态”局面形成(刘伟等,2014)。

## 3 供给视角解析当前宏观经济困境

### 3.1 宏观税收结构

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上,中国一直处于世界上税收负担前列的国家。这也引起国内专家对于中国目前税收结构

和税收负担的关注。通常衡量一国税负水平高低的指标有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究竟中国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处于多高水平,通常可以采用衡量宏观税负与微观税负指标来评价。宏观税收负担反映的是税收与国民经济总量之间的关系,常采用3个不同口径的指标衡量宏观税收负担,分别是大口径宏观税负、中口径宏观税负和小口径宏观税负,具体内容见表2。1997~2013年中国税收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15%,而名义GDP的年均增长率仅为10%,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幅不到8%,很显然税收增幅大大高于GDP增幅,也高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接下来我们在分别计算大、中、小口径宏观税负的动态变化。于中、小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的判断结论是一致的,原因是税收和财政收入的统计数据比较完整。具体来说,小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1994年为10.6%、2004年16.1%、2014年18.7%,中口径的宏观税收负担:1994年10.8%、2004年16.4%、

2014年为22.1%,毫无疑问,从中、小口径的来考察中国1994~2014年的宏观税负来看,呈现不断上升趋势。

大口径的宏观税负水平考察,现阶段中国的财政收入既包括各类别的税收,还存在各种形式的收费、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的收入,大量资金实际处于财政控制之外,可以说政府实际收入规模难以准确度量,这也是学术界对中国宏观税负争议的焦点之一。本文采用郭庆旺等从资金流量表判断政府收入规模的方法。政府收入规模等于生产税、收入税、财产收入和社会保障缴款之和。同样我们可以估算出大口径宏观税收负担:1994年16.8%,2004年22.0%,2014年为38.9%,2007年就已经达到30.2%,大口径宏观税收负担结果与中、小口径一致,20年来中国宏观税收负担一直在上升,也就是说政府收入在近20年来出现不断扩张趋势。

表2 宏观税负三个代表性指标及意义

类型	宏观税负	指标意义
大口径	政府收入/GDP 或 GNP	综合衡量企业和居民的税收负担指标
中口径	财政收入/GDP 或 GNP	客观衡量国家的税收负担指标
小口径	税收收入/GDP 或 GNP	常用衡量国家的税收负担指标

资料来源:李波.我国宏观税负水平的测度与评判[J].税务研究,2007(12):18-22.

衡量微观税负水平也有三个指标: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是以商品和劳务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增加值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中国税收收入30%以上来自于增值税,其次企业所得税20.7%,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6.2%,三项税收占全部税收的60%左右。中国增值税共分为17%、13%、11%、6%、3%五个档次,OECD国家的增值税最高为25%(丹麦、瑞典),最低为15%(卢森堡),平均在15%以下,比较分析来看,中国增值税处于中等水平。但是中国增值税的纳税主体是小规模纳税人,占到总纳税人的80%~90%,小规模纳税人的税率为3%。从国际经验看,对中小企业普遍采用的低税率、高免税线做法,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如日本、卢森堡和泰国对中小企业销售额的税率分别为1.5%、1%和0.3%;希腊、德国、意大利和爱尔兰的免税线年销售额为48 273美元、12 108美元、14 825美元和7 984美元。通过换算,当小规模

纳税人面临3%的税率时,只有在商品批发差价达到21.4%时才与一般纳税人税收负担(增值税17%)持平。国际对比分析发现,中国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适用税率还是偏高。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设置了8个税目,最低3%,最高45%,对比OECD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和税收档次,中国个人所得税税率不算高。企业所得税而言,一般企业为25%,小微企业为20%,国家重点扶持企业为15%。从国际趋势来看,2007年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普遍降低企业所得税,德国为25%,澳大利亚21%,英国、日本和印度为30%,美国分为4挡,15%、18%、25%、33%。考虑到中国企业所得税税前可扣除项目偏少,中国企业所得税税率还是偏高。经济增长的成果好比一块蛋糕,可以分为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分,观察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税负变化,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经济增长这块蛋糕是在不断做大,但是边际增量分割存

在不一致,政府获得比重增量最多,高于总量的边际增量,居民和企业增加明显滞后于政府的增速,这才会导致中国的宏观税负不断上升。此外,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增加的承担不一致,企业通过税负转嫁将税收转嫁给居民,居民最终承担宏观税负提升的部分。这一点可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格局和最终分配格局得到验证。1995年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例为:15.2:19.7:65.1,最终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例为:16.6:16.3:67.1,2000年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例为:17.7:17.9:64.7,最终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例为:18.9:15.6:65.5;2005年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例为:18.0:22.6:59.4,最终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例为:21.0:19.8:58.7;2010年初次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例为:23.0:22.6:54.4,最终分配中,政府、企业和居民的比例为:24.1:18.7:57.2。

### 3.2 企业进入规制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小组(Doing Business)2003年开始对全球各国的进入规制进行详细分析,用来评估一位企业家要开办并正式运营一个工业或商业企业时,官方正式要求或实践中通常要求的所有手续,完成这些手续所需的时间和费用。考察的本地中小型企业拥有50名以下雇员和10倍于该经济体人均国民总收入的启动资本。2015年这个调研已经覆盖了世界上的189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全球进入规制数据库。调查数据证实了他们的预期,经济发展水平与规制强度成反方向变化,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地区的行业 and 部门的进入规制越少,进入壁垒越低,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则相反,规制普遍存在于经济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各个部门和行业,特别是在一些垄断行业。2015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进入规制综合排名首尾两端的新西兰和亚洲的缅甸二者完成一个新办企业的注册程序(个)、时间(天)、注册资本(占人均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和实缴资本下限(占人均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1、0.5、0.3、0和11、72、155.9、6190.1;经合组织高收入国家与经济落后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注册程序(个)、时间(天)、注册资本(占人均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和实缴资本下限(占人均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分别为4.8、9.2、3.4、8.8;7.8、27.3、56.2、95.6和7.3、34.4、27.7、256.4。

2011年《营商环境报告》项目数据中,同样对中国30个城市的新办企业的注册程序(个)、时间(天)、注册资本(占人均国民收入的百分比)和实缴资本下限(占人均国民收入的百分比)进行收集,排名如表3。《营商环境报告》是以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作为样本,通过考察这些城市新企业注册的综合成本来反映政府规制的强度企业进入的影响。从表中的排名我们发现新企业注册综合成本较低的地区,同样是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地区;反之,经济落后地区的新企业注册综合成本同样是排名相对靠后,这证实了良好的经商环境、低门槛的进入壁垒利于新企业的进入,从而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

表3 2011年《营商环境报告》中30中国城市的新办企业综合成本

城市	排名	程序 (个)	时间 (天)	成本(占人均 国民收入的 百分比)	实缴资本下限 (占人均国民收 入的百分比)
杭州	1	12	31	5.7	200
南京	2	12	31	5.8	200
广州	3	13	28	6.3	200
济南	4	13	33	6	200
上海	5	14	35	4.8	200
北京	6	14	37	3.2	200
福州	7	12	40	6.7	200
天津	8	14	41	3.7	200
沈阳	9	14	41	6	200
长春	10	14	37	9.5	224.8
呼和浩特	11	14	48	7.9	200
郑州	12	13	41	11.6	267
海口	13	13	38	12.1	273.2
乌鲁木齐	14	13	44	9	230.2
武汉	15	13	36	13.6	300.8
石家庄	16	14	42	9.8	202.5
重庆	17	14	39	9.5	273.3
哈尔滨	18	14	42	11.9	207.9
成都	19	13	35	19.1	354.4
太原	20	14	55	9.3	243.5
南昌	21	14	40	14.6	317.8
长沙	22	14	42	14.6	289.4
昆明	23	14	42	13.9	383
西宁	23	14	51	12	298.7
西安	25	14	43	15.2	304.8
银川	26	14	55	12	335.8
合肥	27	14	42	19.4	349
南宁	28	14	46	16.5	342.4
兰州	29	14	47	14.1	408.7
贵阳	30	14	50	26.6	605.2

资料来源: <http://chinese.doingbusiness.org/>。《2016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

### 3.3 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升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意义重大,但从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的结果显示<sup>①</sup>,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于经济增长贡献并不乐观。根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1978~1994年为46.9%,2005~2009年为31.8%,2010~2015年为28.0%。在上述三个时期,资本劳动比提高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45.3%提高到64.7%,并预计提高到65.9%。劳动生产率提高依靠所导致的资本劳动比的提升,而从长期来看,这种依靠投资深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提升,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世界银行(1997a)估计的43%,Woo(1998)报告的12.9%,Wu(2003)推导出13.5%,Young(2003)23%,郭庆旺(2005)10.13%,吴延瑞(2008)27%,张少华35.08%(2014)。从亚洲三国和三个发达国家经济崛起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历程来看,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崛起过程中(1961~199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在2%~5%之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60%;发达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率都在1%以上,然后开始逐渐下降,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不低,大多数是在10%~30%。与这些国家相比,一方面,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比同时期略高这三个发达国家,但确远远低于三个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低于发达国家,远远落后与新兴经济体国家。根据Dougherty and Jorgenson(1996)的研究,生产率增长分别解释了1960~1989年间日本和德国产出增长的49.8%和57.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低客观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属于要素投入型增长,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经济生产能力利用水平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尽合理因素制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郭庆旺等,2004)。

创新能力明显不足。根据汤普路透的研究报告,2012年以专利指标衡量全球创新企业百强,中国无一企业上榜;以知名商品衡量的世界品牌100强,中国仅有4个。来自于经和组织对全球价值链最新测算结果,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内附加值比例为67%,美国为89%,德国85%,日本73%。

表4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跨国比较

时间	1961-1970	1971-1980	1981-1990	1991-1995
泰国	2.61%	2.13%	2.62% (34.5%)	2.05% (25.6%)
新加坡	3.88%	2.74% (33.1%)	3.35% (48.6%)	4.81% (56.2%)
韩国	3.22%	2.46% (26.2%)	5.01% (52.2%)	3.18% (42.4%)
日本	2.64%	0.58% (14.9%)	0.63% (17.6%)	—
德国	1.53%	0.82% (29.6%)	0.71% (31.6%)	—
美国	1.78%	0.26% (9.0%)	0.51% (16.8%)	—
中国	1979~2004: 0.891(9.46%)			

资料来源:《生产率测算手册》,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8。

过去的30年中,通过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配置到工业部门,从低效率的第一产业转移到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然而,随着时间的变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减少,未来劳动力流动趋势将是第二产业流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转移,然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低于制造业。基于这样的典型事实,中国经济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不可避免面临下降的困境,这也被称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此外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过程

中,后发国家技术追赶的低基数效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将会消失,这又是拖累生产率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

## 4 基于供给视角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取向

林毅夫认为此次全球经济可能要进入漫长调整期,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能够在短期内创造就业并有利于促进未来生产率提高,这样就可以从一种对危机的被动反应模式向为长期可持续增长创造机

① Louis Kuijs, "China through 2020-A Macroeconomic Scenario," 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9, 2009.

会的模式转变。结合上文对宏观税负、进入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本文认为,从总供给寻求突破是破解当前中国经济困局的必然选择。目前情况下,尽快推出改善总供给,尤其是改善税制结构、减少政府干预、全要素生产率等的各项措施。总需求政策目标是熨平短期经济波动,总供给政策着眼于解决长期经济增长存在的问题。我们按照影响总供给的不同层面,梳理了目前可以改善中国供给面的可能突破点。

#### 4.1 “选择性”降低税率,增加劳动和投资的吸引力

供给学派对税制改革存在争议,正统供给学派推崇全面大规模减税,而中间供给学派则认为大规模减税的效应并不明确,事实上里根政府在减税执行过程中,并没有完全采纳正统供给学派的激进减税方案,而是选择分阶段、分步骤、选择性减税,从预期前3年的减税30%,变成第一阶段减税5%。对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的减少力度相对更大,第一阶段对于个人所得税税率降低50%,第二阶段再削减10%;并把个人所得税与通货膨胀挂钩。在企业方面,特别针对中小企业,对纳税收入在25000美元企业税率每年减税1个百分点,连降3年,对于纳税收入在25000美元企业50000美元企业的税率从20%降至18%,并对企业投资汽车等资产给予6%投资税优惠,机器设备、公用设施、铁路建筑物给予10%的投资税优惠。

从中国现状来看,税收构成中增值税占到60%,增值税的对象是企业,但是根据学者研究结论,其中87.3%是可以转嫁的间接税,12.7%是不能转嫁的直接税,企业缴税虽然多,但大部分是通过税收负担转嫁给家庭和居民,最终的负担主体还是居民。小规模企业所得税3%税率偏高,部分发达国家为0.5~1%,对于中小企业的可以采用国际上对中小企业普遍采用的低税率、高免税线法来吸引中小企业投资。

#### 4.2 放宽更多公共领域,推广PPP模式

经过30余年的高强度工业化建设,传统商业环境下利润较高的工业投资项目基本挖掘殆尽;紧跟

其后的城市化步伐压缩了经济类基础设施的利润空间,政府债务规模扩张,导致其杠杆率从2001年的23%左右上升到2013年50%,接近国际警戒线60%。未来投资选择可能需要以寻找新的投资引擎,带动新的增长点出现为导向。第一,教育、文化、医疗健康服务和节能环保产业,这些对于促进经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第二,以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为代表新兴产业对现有商业生态环境产生冲击,未来将会渗透到更多的部门,也许是决定中国经济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第三,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企业创新的投资。

对于投资主体选择,可以创新制度安排,降低进入门槛,广泛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公私合营模式(PPP)都是被发达国家中证明可以普遍推广的模式,政府可以在公共服务领域寻求与私营部门合作。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是造成各部门的负债率和杠杆的不断攀升的重要诱因<sup>②</sup>,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企业和居民融资成本,鼓励各种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的金融创新。

#### 4.3 依靠市场决定企业的去留,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可以被分解为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和规模效应。现有研究证实,中国的TFP增长更多的是借由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推动,而非通过效率改善获得。未来可以通过改善效率的途径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如资源重新配置和制度与管理创新带来的一切由创新带来的效率改进。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或者升级而获得。劳动力和其他要素从低生产率的产业向高生产率的产业转移,部门间资源重新配置的典型形式。除此之外,部门内部资源重新配置效率主要表现为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规模扩张,或兼并、收购;高效率企业进入,低效率企业退出,这是非常重要的效率源泉。一项美国的研究表明,制造业内部企业进入、退出、扩张和萎缩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率高达30%~50%<sup>③</sup>。

近年来,国内热议“国进民退”的风潮反映出各

② 根据李扬等人(2015年)计算中国实体部门总负债与GDP之比作为杠杆率指标,2001年为140%左右,2008年170%,2013为232%。

③ Lucia Foster, John Haltiwanger and Chad Syverson, "Reallocation, Firm Turnover, and Efficiency: Selection on Productivity or Profitabilit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8, no.1, 2008, pp. 394-425; Lucia Foster, John Haltiwanger and C. J. Krizan,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Lessons from Microeconomic Evidence," in Charles R. Hulten, Edwin R. Dean and Michael J. Harper, eds., *New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Analysi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界对部分行业垄断严重损害经济增长效率的担心。据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 2012 中国企业 500 强数据显示,216 家上榜国有企业的平均收入利润率、平均资产利润率、人均利润三项指标低于上榜的 284 家民营企业。张维迎认为垄断国企是一种“全员寻租”,改变这种状况就需要国有企业退出经营性领域,放宽进入门槛,允许社会资源进入被管制和垄断的行业,只有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才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正如中国古代哲学所说的那样,“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如果没有一个“创造性毁灭”的环境,让缺乏效率的企业消亡,让富效率的企业生存和发展,就无法使全要素生产率、特别是微观效率得以改善。

总之,在经历了长期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模式后,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人口红利消失、国内刘易斯拐点等冲击,中国经济正面临愈来愈多的挑战,总需求调整受到不少制约。单靠传统的逆周期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彻底破解中国经济的困局,为了实现更加合意的经济均衡,现阶段中国应特别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的力量,全方位推进总供给深度调整进程,新供给学派观点需求不足根源是周期性和结构性供给老化导致,而无效管制、行政垄断等直接供给约束以及高税负成本、融资成本等间接供给约束无疑是改善供给的突破口。

## 5 总结与展望

回顾历史上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三种增长模式受到最多关注。亚当·斯密关于制度和社会分工对生产力促进作用的研究奠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库兹涅茨则更多地从投入—产出角度将经济长期增长根源归纳为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升、经济结构升级以及社会结构转变。熊彼特以“创新理论”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认为,生产技术的革新是驱动经济螺旋式发展的核心力量,技术和制度的破坏性创新(destructive creation)才是经济长期的动力。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经济的“斯密增长”时代,而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持续的人力、资源、资本、技术投入换来了“库兹涅茨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点应该围绕供给层面的技术创新展开,以技术创新带动全要素生产提升,并实施第三种模式“熊彼特增长”。

## 参考文献

- [1] 李扬,张晓晶.“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逻辑与前景[J].经济研究,2015(5):4-19.
- [2] 刘伟,苏剑,“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J].经济科学 2014(4):5-13.
- [3] 洪银兴.论中高速增长新常态及其支撑常态[J].经济学动态 2014(11):4-7.
- [4] 姚洋.经济新常态并不意味着低增长[J].中国中小企业,2014(11):15-15.
- [5] 孙立坚.2015 年中国经济展望——“新常态”发展模式如何改变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J].新金融,2015(2):7-9.
- [6] 齐建国.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语境解析[J].西部论坛 2015(1):51-59.
- [7] 林毅夫.什么是经济新常态[J].小康,2014(10月下).
- [8] 刘世锦.2014 进入增长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J].中国发展观察,2014(4):17-18.
- [9] 伍戈,刘珺.破解中国经济困局:基于总供给—总需求的分析框架[J].国际经济评论,2013(5):40-54.
- [10] 滕泰.更新供给结构、放松供给约束、解除供给抑制——新供给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J].世界经济研究,2013(12):3-8.
- [11] 蔡昉.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3(12):56-71.
- [12] 郭庆旺,贾俊雪.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J].经济研究,2005(6):51-60.
- [13] Gordon, R. J., 2005, The 1920s and the 1990s in Mutual Reflectio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11778.
- [14] Woo, W., "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Sources and Prospects", in Fouquin, M., and F. I. moine ( eds. ), The Chinese Economy. Paris; Economica Ltd, 1998.
- [15] 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Rank.1997.
- [16] Wu, Y., " Has Productivity Contributed to Chinas Growth" Pacific Economic Review, 2003, 8(1).15-30.
- [17] Young, A., "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1(6 ), 1220-1261.
- [18] 吴延瑞.生产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新的估计[J].经济学(季刊),2008(4):828-842.
- [19] 张少华,蒋伟杰.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再测度与分解[J].统计研究,2014(3):54-60.

#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upply Improvement: Theoretical Logic and Policy Orientation

LIU Jian<sup>1</sup>, YANG Decai<sup>2</sup>

(1.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Anhui Province 233041, China;*

2. *School of busines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Province 210009, China*)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is likely to maintain medium speed growth in the future for a long time. It will be not a short-term and cyclical phenomenon but a long-term structural phenomenon. If we still relying on traditional cyclical macroeconomic control policy completely,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break the Chinese economic dilemma. So we have to find a more systematic solution in macroeconomic analysi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momentum will no longer rely on investment, export and consumption, but by improving supply to create demand, that is to reduce the macro tax burden, relax the regulation of enterprise and improve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 words:** new normal; supply school; macro-tax burden; corporate regulati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